

今日台湾

陈红民 著

台湾小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0191649

陈红民 著

今日台湾



台湾小丛书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123006 / 03

前 言

真羡慕今天的孩子们，他们幸福而聪颖，不仅享受着比他们的长辈丰富得多的物质生活，而且可以和成年人一样，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最新的知识，了解国家的前途和世界的大势，可以说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双料富翁”。

许多生活在大陆的少年朋友对祖国宝岛台湾的情况十分地关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加以了解，以对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有所贡献。

屈指算来，自己研究当代台湾已为时不短，也乐意将有关情况介绍给孩子们，但写作前却迟迟难以落笔：一个原因是今天的孩子知道的太多，写出来的东西能否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心中没底；另一个原因则是现在台湾社会的变迁快捷（台湾称“社会转型”），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任何事物都是意见纷呈。我曾在一天之内向两批来访的台湾朋友询问同一问题，得到的回答截然相反，更有趣的是，他们都言之凿凿地称自己代表的是台湾多数人的意见。这样的现象无疑给选择内容和立论等方面增加了困难。

以不长的篇幅描绘出一个巨变社会的全貌，那是大手笔才能做到的。我自忖无力为之，只能有选择地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侧面或片断，希望由此打开几扇小

小的窗户,使读者能“以一斑而窥全豹”,透过它们来了解今天的台湾社会。在写作手法上,则力求生动活泼,力求使大家在较轻松的阅读中,获得知识。

今天,存在于海峡两岸之间的坚冰正在慢慢地消融,两岸关系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两岸人民已经走上了沟通的桥。但是,要真正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既要靠两岸政治家们的智慧和明智选择,更要靠两岸人民间的互相了解与沟通,消除长期分离状态所造成的隔膜。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意愿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政策的走向。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让海峡两岸的孩子互相了解,互相关心,增强骨肉亲情,对统一事业会有极大的助益,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基本动因。

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获得一定的知识或启发,就请和我一道来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及有关的编辑们吧,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本书得以面世。如果读者发现书中有疏漏不当之处,敬请指出来,我会十分感激的。通讯地址是: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 210008)

陈 红 民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稿于南京仿秋斋

目 次

从“国小”看“升学主义”	(1)
迎新纳福说年俗	(10)
少数民族风情	(16)
丰富多样的各色小吃	(24)
槟榔折射出的台湾社会	(32)
台湾的“硅谷”	(41)
高雄的填海造地工程	(48)
军队和军事装备	(54)
风风雨雨话台风	(65)
电影业的兴与衰	(71)
行路难	(79)
“塑胶大王”王永庆	(88)
腾飞的“经济小龙”	(98)
疯狂的“台独”	(111)
“转型时期”的社会乱象	(123)
海峡隔不断骨肉情	(135)

从“国小”看“升学主义”

早晨，阳光照耀在台北市建安国小的操场上。

建安国小是台湾都市的一所普通的学校，它的三幢教学楼以前还算是“雄踞一方”的高层建筑，现在却陷落在周围耸立的高楼大厦之间，显得局促而简朴。这几年学生数量激增，全校班级数从70多增加到100多，各种设施都显得不足。尤其是教室和操场，更是拥挤不堪。

每天的课是从八点半的升旗仪式、做体操开始的。学校的操场太小，许多学生只好在各自教室门口的走廊上做操。

上课了，大多数老师都勤恳而敬业，但面对每班平均45名同学的“大班”压力和升学竞争，既无法针对每位学生的特点进行细致的个别辅导，也不敢做新教学法的尝试，只能沿用传统的“填鸭式”灌输法教学，下课时再送给学生们一份分量不轻的礼物——课外作业。学生们刚看过美国电影《超人》，就自嘲地形容自己是“抄人”——一天到晚抄写作业的人。

课间短暂的10分钟，是学生们最快乐的时间：下课铃一响，高年级男生抱着球就往操场跑；女孩子们则去另一边玩秋千，跳绳；爱静的同学抓紧时间去学校的开架图书室借阅课外书籍；有些父母的“乖孩子”还会用专设的投币电话和妈妈说上一通……自然，男孩子间也时常有相互推搡、打斗的事。老师见怪不怪地解释说，他们整天被关在公寓里，与其他小朋友接触很少，学校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难免要借机发泄一下。

放学了，上了一天课已显得疲惫的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刚出校门，立即被等在门外的家长接上车，其中不少人的目的地并不是温暖的家，而是各式各样的课外补习班、“才艺班”（以美术、音乐等课外辅导课的统称）。

建安国小曾对学生进行一次调查：“如果阿拉丁神灯给你三个保证会实现的愿望，你祈求什么？”结果，回答最多的是“月考第一、成绩很好”。有个小朋友写道：“一、我希望天天放假；二、功课进步；三、没有补习作业。”这表达了在升学压力之下，不堪重负的孩子的心声。

“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建安国小的情况，代表了多数台湾普通小学生的日常生活。

台湾当局实行的最重要教育政策，是1968年开始实施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九年教育中前六年称为“国民小学”（简称“国小”），后三年称为“国民中学”（简称“国中”），“国中”毕业后，学生可选择进入普通高中（一般是为了能考大学），或进职业中学继续学习。

日前，台湾共有“国小”2486所，“国中”851所，专科学校77所，大学37所，适龄学童入学率达到99.85%。1986年时，台湾共有各类学校6491所，平均每5平方公里多一点就有一所学校。台湾是比较重视教育的，在预算投资方面给了一定的扶持，到1983年时，台湾用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投资，已达人均129美元。1990年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占台湾“总预算”的15%以上。在“望子成龙”的传统思想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不少家长视子女的教育和升学为家中“唯此为大”的大事，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在这种全社会都重视教育的大环境下，台湾的教育事业有了较迅猛的发展，有了一个层次完整、结构合理的教育体系。而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又为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各类人才和劳动者。

下面这所也许可列入“世界之最”的小学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教育的面貌。

这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学校了。全校一共才三个人：一个三年级学生、一位教师、一名工友。台湾宜兰县山区大湖国小的双连分校，是一所为方便山区农家子弟入学而建在山顶上的小学。

随着经济发展与公路的开通，农民大都举家迁往山下，双连分校的学童越来越少，到1991年时就只剩下三年级学生苏荣祥。

每天，苏荣祥坐在空荡荡的大教室里，一人独享老师的教诲。他很用功，但毕竟是好动的孩子，空旷冷清的学校里没有可以玩耍游戏的小伙伴，难免感到寂寞。他苦恼地说：“一个人上课好无聊，下课都没人和我玩。”

学校的李老师家住城里，每天要包计程车（出租车）上山，虽然辛苦，又只有一个学生，她却十分热心，教学完全与山下学校一样。她说：“教一个学生和教一班学生，在心态上应该是相同的。虽然只教一个学生，也不能轻视怠慢，因为教育是良心事业啊！”

当然，山顶小学毕竟条件受到限制，李老师也不是“全能教师”，文化课以外的体育、音乐等课程只能“凑合”。如体育课就改为师生二人在山间小道散步，增加体力之余，李老师顺便向苏荣祥传授“乡土文化”知识。李老师的音乐知识也有限，音乐课则只好放录音

机。

有关部门觉得每年以 50 多万元新台币维持一所仅有一名学生的学校，代价未免太大，并且条件简陋对学生本人的成长也不利，想关闭双连分校，并许诺，如果苏荣祥愿意转到山下小学读书，可以专雇计程车，天天接送他。然而苏荣祥的父亲却不同意，说孩子留在山顶小学，能就近照顾多病的母亲。山顶小学的上级大湖国小也认为，给每个适龄学童受教育的机会，是教育的根本宗旨，反对撤销双连分校。

最后，这所全世界最小的小学，仍保存了下来。

虽然台湾当局比较重视教育，中小学有充足的经费，有较好的教学条件，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前进，近年来台湾的中小学教育也暴露出许许多多的弊端。

最大的弊端是，整个教育以“联考”（全台湾统一进行的升学考试）为导向，在普遍追逐“名”与“利”的社会风气之下，升学率成为评定学校、教师教学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上名牌大学是学生的最高理想。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最关心的，是考试分数的高低和能否考上名牌大学。结果，学校按照成绩优劣编班，约有 30% 的学生编入“A 段班”，他们是学校争名次与升学率的重点所在，为他们配备了最强的师资，而另外 70% 左右考试成绩不理想，升学无望的学



图1 一幅反映小学生课业沉重的宣传画，你看他：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抱着提琴，背后有个大书包，外加计算机的键盘，肩上还有一包能将100分一网打尽的参考资料，好累哟！

生（台湾称为“后段生”）被当成包袱，对他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后段生”们受到歧视，一些人便自暴自弃，成为校园暴力和青少年犯罪的根源。即使对“A段班”学生，教师也只关心他们的智育，在本已沉重的课业之外，还拼命给他们补习加课，开小灶（台湾称之为“恶性补习”或“恶补”），学生受到的压力极大，不堪负担。

如此一来，学生只能围着考试的指挥棒转，没有课余爱好，小小的年纪便戴上深度近视眼镜，失去了天真与童趣。

有一项国际性中小学生学习成绩调查表明，在18个国家和地区中，台湾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成绩名列同龄组第一（美国第八），中学三年级学生在同龄组中居匈牙利、日本、荷兰之后列第四。但学生大学毕业后在科技方面的实际成就，台湾却远远落在后面。鲜明的对比结果，显示出台湾教育重名轻实、重分数轻能力、扼杀和抑制学生潜能的弱点。有的报纸还尖锐地提出“台湾为何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科技人才？”的问题，发动了一场大讨论。

在“升学主义”、“智育第一”大棒的指引下，学校和家长也忽视了对学生的道德熏陶，许多学生连基本的生活礼节都做不到，学生自私自利、缺乏社会公德的情况随处可见。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巡视台北的小学时，惊诧地发现，虽然学校的设备很先进，厕所已改建为封闭的冲水式，可学生进去后既不会随手关门，也不冲水。教学楼是新建的，但楼梯上、走廊间都是随地乱吐的口香糖，他曾为此对着全台湾的国中、國小校长们大发感慨。

正因为如此，台湾民众才一再提出要求废除“联考”制度、实行“常态编班”（即不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编班标准）、严格禁止“恶补”。这种呼吁已经成为强大的舆论声势。

詹辉德是台北市万芳国中的一名普通教师，他亲眼见到教育体制与内容的缺点与弊端导致了许多青少年堕落，曾一再向报刊写信，揭露学校教育存在的黑暗面。他的意见虽然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却不为官方所接纳。后来，他自己的孩子进入中学，被编入“B段班”，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品德也亮起了红灯，成了直接受害者。

1990年7月，詹德辉夫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到台湾“教育部”门前绝食示威，抗议不公平的分班教育，要求挽救“后段生”。绝食行动持续了4天，引起各界的广泛瞩目。以后，他们又联合与他们有同样看法的教师、家长组成了“教育改革会”，为改革教育体制而奔走呼号。

目前，台湾的教育主管当局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亡羊补牢的措施，如严令禁止“恶补”，规定各校必须实行“常态编班”，违者追究校长的责任。同时，也在进行毕业生直接升学的试点，准备时机成熟后废止行之多年而为众人所指责的“联考”制度。

然而，人们对当局的这些措施能否奏效普遍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教育毕竟不是空中楼阁，它离不开台湾的社会大环境。在到处弥漫着工商气息，名利观念

十分浓厚的环境中，“教育”很难洁身自好，不受污染。所以，虽然上级三令五申，许多学校依然是我行我素，只不过手法上略作变更，把过去公开的活动改成“地下”进行。果然，就在当局的有关禁令出台不久，就有大量关于学校违规的举报。此外，“联考”制度虽然弊端丛生，但它也含有“公平竞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合理因素。台湾民众也担心，用毕业生直接升学的方式来取代它，可能会失去共同的标准，教师和学校方面以个人好恶推荐学生，其结果更堪忧虑。

迎新纳福说年俗

农历新年——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影响十分深远。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必定保存着过春节的风俗。不过，因文化传统稍有不同和历史变迁，各地春节的具体内容，有一些大同小异之处。

台湾春节的风俗基本上来自大陆，又融入了当地的一些传统习俗。

一进入农历十二月（即“腊月”），台湾过年的气氛就浓起来了。

腊月十六这天是“尾牙”。因为早年生活艰困，台湾风俗中，每个家庭每月的十六都要设法改善一次伙食，称为“做牙”，而十二月的十六是一年中最后一次做牙，故称“尾牙”。这一天，各家各户要摆上大鱼大肉，祭供土地公公，感谢其一年来的保佑。同时，各公司老板也多设宴款待职员，并送上装满钱的“红包”，犒赏职员们一年的辛劳。

“尾牙”一过，年关的脚步便越来越近了。家家忙

着采购年货，添新衣，做腊味。商店则披红挂彩，以大幅广告推销商品。那几天，商店里从早到晚挤满了购年货的人流，每人手中提着大包加小包，满载而归；亲友邻里之间，公司、机关的上下级之间，也会在年前互赠些礼品，以感谢对方一年中对自己的关照。

腊月二十四是祭送“灶神”的日子。据传说，每年这一天，各家的“灶王爷”要带诸神升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人间善恶，玉皇大帝据此决定来年各家的祸福。所以各家一早都供上丰盛的祭品，烧金纸，为“灶神”送行，无非是希望他能“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平安”。

过了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便开始了大扫除。因为老年人一般都有点迷信，平时不许搬动家具，怕得罪了鬼神，所以要等二十四送走“灶神”后，才能无所顾忌地进行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新年。卖春联的人也在街头摆上摊子，为人们写春联迎春。

接下去，各家各户都要做些年糕。过春节吃年糕，是台湾的一大特色。年糕的种类很多，而且每种都有特殊的含义：“甜粿”代表甜蜜幸福，吃了“发粿”能发财，吃“红龟粿”可以长寿等等。

腊月三十是农历的除夕，旧年的最后一天，节日的气氛自然也就越来越浓了。家家户户都贴上春联和



图2 贴门神，迎新年！

门神，大红的春联上不外是“添丁进口”、“风调雨顺”、“招财进宝”等一些吉祥的词语。这天晚上，是一年一度全家大团圆的时刻，台湾人叫作“围炉”。辛劳一年的全家人围坐一桌，吃丰盛的年夜饭，长幼有序，互相祝福，充满了一种难以用言辞表达的、中国式的亲情、友爱、温暖与欢愉。远在外地的游子，此时也会心急火燎地驱车返乡，同家人团聚。年夜饭的最后，每

人都要吃一块“发糕”。

直到五六十年代，台湾农村中仍盛行“童养媳”（先将未成年的小女孩接到家中，待她长大后再与自己家的儿子结婚）的风俗。通常情况下，长大了的童养